

Week Topic : The Social Order

Presenter : 黃詠芯

ID : M016070006

Date : 2013/4/30

# The Social Order

## 第一節 社會身分

在日本，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特色是：單一種族。日本缺乏種族和語言上的變化，這在亞洲國家不是單一特例，這是政治發展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同種族且使用同一種語言，而且擁有相同的信念。

## 第二節 社會地位

假設社會系統是一個團體內部的巨大網絡，那麼團體內的階級劃分是依照社會地位而訂。社會階級的劃分是根據成員間的職業、教育、成就還有家庭背景來決定。日本政治和經濟上的領導人物大多是這種社會階級劃分的代表性例子，他們大多畢業於法律、政治、經濟、物理科學和電子這類的科系。很少有總經理級的人物畢業於社會科學或人類科學的，而且超過 50%的高階人員都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東京大學。這些人皆是高知識分子而且消息靈通的。

直到今日，日本的政治、經濟領域裡的高階人士仍主要由那些有家庭背景——父親亦為相同職業上的高階人士的兒子所繼承。很少有人可以不依靠高等教育和家庭背景的支持就獨自在社會上取得高聲望和龐大的財富。現在約有 61%的高階人士的父親是來自同領域的高級部門，但他們的父親只佔那時代約 11%的人口；另外有 31%的高階人士表示他們來自次中產階級，而他們的父親亦為中產階級出身，也只佔那時代約 21%人口；剩不到 10%的高階人士的家庭背景是工人階級，但工人階級在日本社會裡卻佔 70%的人口。

在傳統上，家庭背景影響深遠，且具決定性的力量在選擇職業和事業的發展上，這情形在企業家和總經理兼特別顯著。儘管日本進入早已進入工業化時代，但社會的垂直流動情形似乎沒有明顯地增加。有雄厚家庭背景的幸運兒可以充分地享受高社會地位，迅速發展事業的機會，在這團體裏需要的是背景和人脈，不需要“神童(whiz kids)”。不是精英團體內的人，想要獲得社會地位提升的機會是相當少的。而這套封閉的人際背景模式也成了外國人士到日商工作時的挫折主因，任何重要決定皆須由日本母公司的主管核簽，也很難獲得升遷高階主管的機會。團體間的網絡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緊密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上。有些西方

商業人士認為無法打入日本市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強烈的社會團結意念和對團體的忠誠。雖然經濟的迅速發展會促使社會階層的垂直接流動，但在日本，想要達到更高的社會地位、晉升機會的方法的主要方法仍然只有一個——高等教育。

### 第三節 個人與團體

在美國社會裡，個人主義和隱私是很重要的；日本社會，同樣強調人際關係和團體本位主義(Groupism)。透過社會力量強化了人際關係，從教室到工作場所皆能看出人際網絡的存在。在日本，上班族的辦公位置都是相連在一起的，不同於西方國家偏愛的個人小隔間。連經營者也在公共辦公空間裡辦公，而不是在私人辦公室裡，這種做法能讓整個公司更團結。美國人時常誇大日式的群體主義，但在世界各地裡，明顯的群體意識是相當常見的，像美國社會那樣的個人主義、獨立自主意識強烈的社會反而是較特別的！社會的同質性高並不意味著沒有衝突發生，日本社會也時常發生爭奪名聲地位、金錢和他們認為值得去爭奪的事件。日本社會的衝突往往透過遵守嚴謹的一套行為規範，轉化較小的摩擦事件。

有理論認為團體本位主義是日本傳統的稻田型農業社會化後的成果，另一種理論則認為是氏族在日本歷史上的重要性沿襲至今。群體主義從小自家庭習慣養成，日本家庭若沒有安裝中央空調，會習慣在冬天時圍在一起使用暖爐，這種情形下很難有個人隱私存在。幼童與家人，特別是與母親的相處時間比美國家庭相比，多出很多，給了孩童更多機會去依賴母親。團體本位的特性，正式日本企業家的經營策略會特別重視遠程計畫的主要原因。

壓力團體的存在在某些時候對政治特別具有影響力，特別是農民，西方國家的農民並非重要的政治影響團體。但在日本，農民雖然逐年減少，但他們集票能力強，可以產生極大的力量。農村地點一直與農業協同組合(農協)有親密關係，農協中心組織為總和農協，99%由農家組成。日本全國有四千多個農協單位，若能集中醫治即能發揮強大力量，雖然自 1975 開始，農林漁民已經不在是自民黨的主要支持者了(約佔 20%)，但繼續維持農林漁民的補助金是為了消除地域間的差異，達成振興村落的政策目標之緣故。

### 第四節 社會差異

#### 1. 介紹

日本為一島國，有海洋作為天然的屏障，讓日本除了二戰後的美國佔領時期外從未被其他國家正式佔領過。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也尚未席捲日本，在商業貿易國際化後，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仍然是少數，而且通常與日本人分開居住。日本文化認為沒有在日本出生長大，不能算是真正的日本人。

#### 2. 在日韓國人

二戰時，大約 65 萬左右的韓國人被強迫到日本的工廠和礦山工作，彌補因

為戰爭而缺乏的勞動力，甚至被強迫進入日本軍隊裡。大多在日本的第二、三代韓國人並沒有歸化成為日本人，但年輕的在日韓國人則希望能歸化日本，與日本人之間的通婚也變得較頻繁。就算他們都說日文，但僅有一部分的在日韓國人選擇歸化。直到最近，他們正式拒絕進入官僚機構和公立學校的工作。身為外國人，他們沒有投票權和遭受歧視，1992 年日本政府同意取消在日韓國人按壓指印和隨身攜帶身分證的措施，但他們依然被視為外國人，到他們成為公民為止。在日韓國人失業率相當高，比在美國的黑人還要高。1930 年代許多在日韓國人參加日本共產黨(JCP)，從而變成在和平保護法下被掃蕩的左派，因此在美國佔領時期時常遭到猜疑。

在日的韓國組織：

- 誠和會(Seiwakai)：由入日本籍的公民組成。由於已入籍韓國人大多不想再提及他們的祖先，組織的成員人數不多。
- 朝總聯(Chongnyon)：是一個位於日本的北韓人組織。由於北韓與日本並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此組織事實上承擔著維持日朝關係的外交機構的角色。在北韓勢力衰弱後，朝總聯的吸引力下降。
- 民團(Mindan)：由南韓政府所支持，大多訴求同化和在日韓國人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目前約 61 萬居住在日本但未入日本籍的朝鮮人中，65%加入了民團，而 25%加入了朝總聯。

### 3. 國際難民問題

日本在龐大的國際壓力下授予永久居留證給約一萬民越南籍的船民(Boat people)，其中一部分的人利用這個機會再去申請進入美國，目前大約 10 萬非法移民居住在日本。儘管有文化上的障礙，且大多只能做 3K 產業(骯髒(汚い, Kitanaï)、危險(危険, Kiken)、辛苦(きつい, Kitsui))，但就業的誘惑依然是強大的，特別是在 3K 產業他們有較多的機會去得到工作。1989 年，一些中國人試圖假裝自己是越南人進入日本。日本政府認為，這些人不是真正受迫害的難民，是經濟機會主義者，把他們遣送回中國。東南亞和中國企圖到日本的難民，逐漸增加日本的壓力。這是複雜的問題，國際難民地位的往往是含糊不清，因為當中有許多不符“政治難民”資格，可能是宗教信仰上的迫害。那些逃避迫害的難民背後，許多只是藉此機會，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只為獲得更好的生活的移民者。

### 4. 「生而不平等」的日本「部落民」

どわ和村民(village people)的前身為部落民(Burakumin)和穢多(Eta)，是一種古老的種姓制度，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社會。他們是社會上被壓迫的弱勢族群，從事最令人反感的骯髒工作，如皮革業、屠宰業。主要的政治組織為部落民解放聯盟(Burakumin Emancipation League)，在 1970 年在變得較活躍，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社區，增加經費補助他們，特別是在教育方面。即使明治 4 年日本實行「賤稱廢止令」的解放令，但直至今日，在法律地位雖然平等，但在經濟、社會等其他方面卻備受歧視，在人際關係、婚姻、求

職以及公共建設上都有差別待遇。尤其是在婚姻和就業。許多父母若發現子女的對象有部落民背景，會要求子女取消結婚。現今日本社會對「部落民」的差別待遇首見於 1975 年 11 月曝光的『部落地名總鑑』，該書記載著全日本部落民的姓名與住址，其目的是為了排除部落民的求職或通婚，而經由徵信社透過有權調閱政府戶籍資料的「行政書士」等八種行業，秘密取得戶籍資料後出版，在許多大企業與個人手中流傳，因為大量印刷卻又不能公開販售，所以售價並不便宜。

另一個受壓迫的弱勢族群是 Utari 或稱阿依努(Ainu)人，他們的祖先是日本最早的居民。人口少於兩萬人的阿伊努人到今天仍在北海道生活。但是阿伊努人不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日本政府不承認他們作為一個獨特的少數族群。

## 第五節 女性

除了少數群群和外國人外，女性是日本社會歧視中最明顯的例子，包掛私領域和公領域。戰後的改革，在 1947 年憲法的平等的權利，包括要求離婚，賦予婦女充分的法律地位，和其他國家一樣。在 1960 年代開始，日本離婚率開始增加，在 2003 年達到了歷史高點，每 1,000 人有 2.3 離婚。這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首先，社會對離婚的態度已經改變，不在把離婚視為失敗的恥辱。其次，女性有更多的機會進行財務自主和風險分攤。第三，一旦離婚後，婦女的態度會相互區別賺錢的人和家庭主婦。但是離婚仍然是一件高風險的決定，離婚的婦女可能無力負擔自己和小孩的生活費，而且仍有許多人把離婚視為是一種恥辱。

- 生育權：

直到最近，避孕藥當作治療用，不是為了防止懷孕和計劃生的一環，直到 1999 年 9 月 2 日，政府批准用於一般用途的避孕藥。婦產科醫生們曾反對政府核准一般用途的避孕藥，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高額的墮胎費。現在婦產科醫生們也能賣政府規定的避孕藥物，這種做法在許多國家被視為利益衝突。日本政府擔心核准避孕藥後會進一步降低日本的低出生率。已被合法化的避孕藥仍是容易獲得。婦女必須經過考試，比起在美國的女性，其成本更是大幅增加。

- 教育：

戰爭前社會普遍期望女性應該是“好妻子和聰明的母親”。女童被侷限於家裡，所受的正規教育很少。大學是不接受女性就讀的。美國佔領期間和之後推出的改革讓女性迅速納入教育體系。在 1955 年，47.4% 的女性在適齡進入高中就讀，而在 1970 年為 82.7%。在 1955 年只有 14.9% 的女學生取得高等教育，但在 1970 年上升到 23.5%。到 2002 年，四年制大學的女生入學率已經達到 38%。同一年，兩年制私立高校女生入學率是 89%。然而，在這些院校的招生總數有所下降。許多女生選擇報讀大專院校，較少選擇競

爭較激烈的有名四年制大學。很多家長都不願意讓女兒到四年制大學，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影響到她們的結婚計劃。這些就讀大學的女生通常攻讀文學，護理學，或家庭經濟。

- 就業：

目前的日本就業市場裡，低於 30% 的日本企業會考慮僱用女性來擔任管理或技術職務。其餘 70% 的公司裡，大部分對女性開放的工作是生產線工人，秘書，辦事員。只有極少數女性在專業，如醫學，法律。在輕工業，如紡織和電子也有一些女性可以找到工作。服務員，售貨員，或電梯服務員，女性職員幾乎都被認為是“臨時工”也意味著女性沒有得到公司福利，培訓機會，家庭和住房津貼及其他收入補充，這通常只給男性正式員工。

女性在外國公司也也不錯的就業機會。外國公司在日本，需要面對日本僵化的社會制度限制。日本男性習慣以日本方式(Japanese Style)談生意，不願意去接受外國公司所使用的程序。日本女性在日本企業裡通常不會被賦予重要任務。因此，她們比較不會有日式偏見，更傾向於學習新的做事方式，這反過來又給了她們更多的機會獲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另一個主要就業領域是教育體系。雖然 50% 的小學教師是女性，這一比例逐漸在更高階的教育體系中下降。在大學和學院很少有女性教師，而且研究人員和科學家幾乎沒有女性研究者。當然，這在西方社會也是很普遍的。

女性還面臨著在其他方面的歧視。雖然婦女佔 39% 的勞動力，但薪水只有男性職員的 53%。很多的事業發展所必需的培訓計劃，她們也被排除在外。在工廠工作的女性絕大多數是年輕單身的，或剛結婚。雇主預計她們在懷孕後會辭去工作來照顧小孩。即使她們想抵抗社會壓力當個職業婦女，卻仍有許多障礙，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托兒設施。

- 政治：

在政治上，女性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因為他們不一定會投票給關心“婦女問題”的候選人，很少有婦女積極參與政治。1980 年代中後期的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日本社會黨領袖（JSP）一個後來成為眾議院議長的女性——土井多賀子(Takako Doi)。

## 第六節 政治團體

政治團體，其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或哲學體系的承諾。日本人重視精神價值，但他們不喜歡制度化的宗教。因此在日本並沒有像天主教那樣的宗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基督教各教派的信徒皆屬少數。神道(Shinto)，將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些日本，雖然很多精神價值被廣泛地共享。

制度化的宗教在日本的大眾社會間不受重視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 Helen Hardacre 研究，其中之一是對宗教的政治化有負面印象。另一個是因為奧姆真

理教，產生了強烈的對抗反應和政府監管收緊宗教的興起。在 1995 年 3 月，邪教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系統釋放沙林神經毒氣，造成 12 人死亡。四個奧姆真理教成員犯下這種行為被定罪判處死刑，另一個被判終身監禁。許多日本人都沒有找到固定的社會群體的會被吸引到價值創造學會(創價學會)，於 1930 年舉辦，這是作為一個非正統的日蓮正宗佛教教派的支派。尤其吸引家庭主婦和勞動者。它的成員包括一些專業人士，農民，教育水平高的人。奉行其教義的公明黨成立於 1964 年，創價學會哲學思想正式到政治舞台上進行。